

图书馆抗“疫”进行时，多种方式赋能文献信息服务

本报讯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开展，为保障公众的学习与阅读需求，各级各地图书馆纷纷立足实际，调整和创新图书馆服务方式，制定了线上线下“硬核”方案，全力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工作以及防控期间的文献信息服务工作。

上海图书馆：联手鄂图打造方舱数字图书馆

2月22日，上海图书馆联手湖北省图书馆向湖北武汉方舱医院的患者和医护人员开通“上图方舱数字图书馆”，通过湖北省图书馆方舱数字文化之窗的“浦江伴读”频道，把上图优质资源送进武汉方舱。

上海图书馆打造的“上图方舱数字图书馆”包括90多位各界名家的手书寄语，530场精彩纷呈的在线讲座，2万余种期刊、近1000万篇文献，1.7万余种电子书、2万小时的听书资料、3500部阅读视频以及4500多本

英文原版书，还有3万余种，其中包括8565种家谱全文影像可供线上查阅。

关于家谱资源，上图目前已经整理编目的馆藏家谱共有3万余种，有8565种实现了全文开放，只要能连上互联网，无需登录，直接搜索点击，即可翻阅扫描的电子版全文影像（PDF格式）。上海图书馆还打造了“中国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供读者体验在线捐赠、在线修谱、在线识谱等服务，接下来上图还将与各大收藏机构进行在线合作编目，续写《中国家谱总目》，进一步增加线上全文开放的数量和目录的数量，提升用户体验。

辽宁省图书馆：编辑古风防疫宣传画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期间，辽宁省图书馆提供了海量的线上资源，编辑了一期防疫宣传画，作为图书馆人的独特致敬，吸引了大量读者，也让以古籍为

代表的传统文化进一步走进公众的生活。

所有的宣传画都是古典风格的，均来自图书馆古籍之中的版画，包括《喻世明言》《帝鉴图说》《太上感应篇图说》《绣像传奇十种》《明珠记》《西游记》《芥子园画传》《续泛槎图》等。如展示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187号墓出土的戴帷帽的女子图片，提醒人们“出门记得戴口罩”。帷帽，在武则天时期大为流行，应该用藤席编织而成，帽檐上装有一圈纱网，可以理解为唐代女性的一种口罩。这种古今之间的联系，更有助于古籍的“活化”。

北京大学图书馆：创新推出送书到楼服务

“病毒无情，图书传情；疫情虽急，服务不停”。在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大学图书馆安排专人值班保障在线资源和相关服务平台正常运行，让师生能够在线检索和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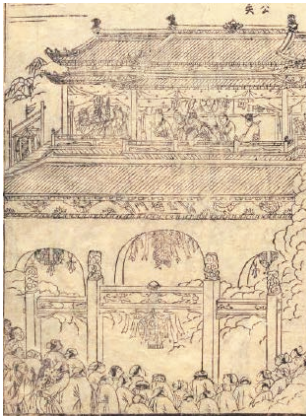
用图书馆的电子资源。校外人员通过CARSII也可以直接访问相关电子资源。如有其他需求，可到相关主页，根据说明提交服务请求，值班馆员会在线处理，如需要提供盖章的纸质检索证明，馆员将会邮件通知取件时间和地点（错峰取件）。

此外，在保持线上服务正常运行的基础上，北京大学图书馆创新推出“送书到楼”服务。服务自2月3日起试运行。在确保馆员、读者安全的前提下，师生可以通过图书上门服务系统在线提交借阅请求，图书馆则组织馆员在规定时间内把书送到燕园校区的学生宿舍楼、实验楼、办公楼、勺园9号楼等指定地点。出馆图书用专用塑料袋包装，且采取安全方式交接。据了解，试运行仅一天时，就有25位读者提交了申请订单，经过馆员的准备和派送，总计成功完成了91册图书的派送任务，得到了申请师生的好评。

辽宁省图书馆古风防疫宣传画



△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停止人群聚集活动

酸性纸文献的维护对策



特邀嘉宾：刘家真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古籍保护专家)

凡是纸张的pH值小于7或6.5(在不同标准中)的纸都是酸化纸。碱性纸在不良的存展环境中也可以酸化，但本文中定位的酸性纸是指由于造纸过程加入了酸性施胶剂(如硫酸铝等)或采用了木质素含量高的造纸原料(如磨木浆)而产生的酸性纸张，这类纸张生产出来就是酸性的。

使用酸性纸印制的书刊，起初看不出它与非酸性纸有何差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酸性纸会不可避免地变得脆化和碎化，尤其是在光与空气污染的存展环境中会迅速恶化。最坏

的情况下，它仅有约25年的使用寿命。要想使酸性纸文献得以尽可能长久的提供利用，必须从其生命周期的开端开始，首先鉴别其保存价值，然后分别采取不同的措施进行维护。

1. 脱酸

脱酸是指用碱性物质中和纸中酸的过程。它通过向酸性纸张施加碱性化学品来降低其酸性，是当前保存某些酸性纸文献原件的一种选择，不仅可以去除纸张中的酸，还可以阻止纤维素的氧化降解。通过脱酸处理，纸内还会残留一定量的碱性物质，可显著地稳定纸张的主要化学成分纤维素，防止纸张变得脆弱和易碎。有文献指出，经脱酸后的纸质文献，在良好的保存环境中，可延长其寿命约三倍。

脱酸适用于尚未发展到脆化并具有一定机械强度的酸性纸，而纸质相当脆弱并易破碎的纸是不宜脱酸的，或只能修复后才可以考虑脱酸。脱酸后的文献则必须放置在良好的保存环境中，否则无法达到延迟纸张弱化的目的。

2. 保存环境

无论是否为酸性纸，在适当的环境中储存是长期保存纸质文献的必要条件。有研究指出，如果将酸性纸文献正确地存放在凉爽、黑暗、干燥的环境中，该文献有可能保存几十年，即若存储环境恰当且科学地保管，酸性纸的文献可以不需要立即采取其他保护措施。

酸对纸张的破坏是需要水分的，存储在潮湿环境中的酸性纸损坏最快。因此，调控酸性纸文献保存环境的温湿度非常重要，特别要求相对湿度保持长年稳定，纸质文献推荐保存的环境相对湿度在50%-60%的范围内，一天之内相对湿度波动范围不得超出±5%。没有恒温恒湿空调的不间断调控，是很难达到以上要求的。

使用内装具(如书盒等)也是很非常重要的措施，密闭的书盒书套不仅可以保护酸性文献免受光、尘的影响，也有缓解环境温度和湿度快速变化的效果，但若是大环境的温湿度长期波动，书盒书套内的温度和湿度也会受到影响，这是

必须要关注的问题。

3. 干燥的冷藏环境

另一种延缓酸性纸文献使用寿命的方法是将其放在干燥的冷藏环境中储存，这可以使大量必须保存原件的酸性纸文献在无法抢救前处于稳定状态。但这种方法是有局限性的，它会影响文献的利用。

那些纸张尚未脆化的酸性纸文献，可采用这种方式保护。对于酸性纸或已经酸化的纸，良好的存储环境只能减缓它脆化的速度，是无法逆转这一劣化的趋势的。因此，对于信息必须长期保留的酸性纸文献，还得考虑转换信息的承载介质。

4. 将酸性纸承载的信息内容转换到其他介质上

对于“无法阻止劣化”和“已经难以读取信息”的文献，在其文献的信息内容被认为是具有利用价值且必须保留下去时，可以考虑将酸性纸文献上的信息转换到其他介质上，包括数字化、缩微、复印或重印等。

这种保护措施仅仅保护的是文献内容，而不是酸性文献原件的本身。被置换到新载体

上的文献内容可以作为酸性纸文献的替代物提供利用，而承载该内容的酸性纸文献可以选择脱酸并保存在良好的环境中，或是只有任其自然生灭。

无论是缩微、数字化还是简单的复印都会对原件造成一定的损坏，在信息复制过程中除必须确保原始信息内容的完整保留外，还要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对原件的损坏，特别要注意不得按压酸性纸书刊、文件的装订处，这是酸性纸特别容易断裂、破碎的位置。

为了避免酸性纸张造成的损坏以及降低重要书刊文件的保存费用，首选的是采用中性纸或碱性纸写印重要文献，这个问题已经在发达国家成为行动。例如，日本1986年开始对本国出版的书籍进行中性纸使用率调查，发现最初中性纸的使用率低于50%，但到第19次调查(2007年)时发现，中性纸出版物已经达到了95%，大多数新出版的书籍都是用中性纸制成的。



众说：

在“中国通”带领下邂逅斯道文库藏书

高旭日

斯道文库是日本搜集和研究汉籍的中心之一，其中有专门收藏书志学的书库。此行我们便主要访问的斯道文库。与复旦有着诸多渊源的高桥智教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用流利的中文向我们介绍了自己所带的研究生和斯道文库的情况。他的研究生大部分是中国人，有研究东洋文化史的，也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他还向我们发出了邀约，希望我们也来庆应跟他学习中国典籍相关的学问。之后，斯道文库的库长佐佐木先生将我们带至办公地带，他的研究生也一一向我们介绍自己。其中，有位来自意大利的留学生，他目前的研究计划是从目录学的角度看《庄子》在日本的流传，兼及学术的流变。他说得一口好日语，中文也能听懂，还能读得懂中国古籍。我在那瞬间觉得，中华民族的文化宝藏受到全世界的关注，我们也应该好好地重视这些宝藏，发掘其中的价值。

进入书库后，我发现书架的每一层都有一条横着的铁栏，取书时可以拉下来。有的书架上还有绿色网兜来固定。佐佐木先生向我们介绍，这是为了防止地震时书籍倾倒所用。他还为我们展示了他认为对我们有所帮助的古籍，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套书摆放在一起时，书背上会形成一道斜线，如果摆放错误便会及时发现。佐佐木先生认为这种装帧很有趣，询问了资深古籍修复师黄正仪老师的意见。黄老师表示，这种装帧方式在中国古籍中也是有的，并不是日本独有，但后来这种方式并不常

见了，不过，在现代的一些印刷行业还是可以见到类似的做法。

裴震

斯道文库以麻生太贺吉捐赠的图书为基础，分设安井、浜野、户原、龟井家学等文库，入藏汉籍约 14 万册，尤以音韵学古书较为珍贵。高桥智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斯道文库的藏书源流，之后我们分两批进到书库，从坦堂文库开始，高桥智先生和佐佐木孝浩先生为我们讲解藏书的特色和装帧特点，印象较深的是文库里有一个书架上全是藏的越南本，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越南本的存在。越南本的装帧非常有特点，书衣和护页都是大红色，涂有防虫颜料，订线方式也和传统古籍有很大不同，让同学们受益匪浅。

梁旭莹

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的高桥智先生是一位爽朗的“中国通”，与我们可以用很流利的中文进行交流，也曾经是复旦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斯道文库原先是一个财团的藏书，后来捐献给了庆应大学。这里面收藏了许多珍贵的版本，甚至有少量的宋本。在麻生太吉贺捐赠古籍的基础上，还分设了安井、浜野、户原、龟井家学等文库，入藏汉文古籍约 14 万册。较为有特色的是，斯道文库中还收藏了许多的越南本，这在越南本土、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极为罕见的。这些越南藏本，其书衣和护页都采用了鲜艳的颜色，且前后都夹有

防虫纸；开本较大，装帧的方式也与汉文古籍大有区别。

严天月

在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高桥智先生给我们介绍了斯道文库藏书的基本情况，其中重点介绍了该馆的宋刻本《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平安时代（相当于唐）抄本《四分律藏第三分尼出家捷度》及以儒学见长的安井文库、以文学为主的坦堂文库、研究甲骨的林泰辅自笔稿本类及法国汉学家捐赠的 Gaspardone 文库等。

随后，高桥智先生与斯道文库长佐佐木孝浩分批带领我们参观书库。斯道文库是按照日本的图书分类法，把汉籍和日本书籍一起排架放置。很多古籍虽然没有函套，但是也有用简单的无酸夹板包裹起来。佐佐木先生还给我们介绍道，坦堂文库的一些汉籍，书背处有不同颜色的斜线，黄正仪老师解读说这是为了表示书籍册次次序，方便馆员和读者快速整理。另外，我们还看到了缝绩装形式书籍。这种装帧形式在唐代比较常见，如今中国已少有，而在日本装帧时还保持这样的传统。佐佐木先生还给我们展示了日本风格书衣的《唐韵》、日本仿朝鲜刻本风格的《孝景本纪》（黑口、花鱼尾）。此外，我们还留意到斯道文库中放置卷轴的书架有渔网罩住，据了解，这是防地震掉落的装置。斯道文库的馆藏温度湿度都是恒定的，可见，在馆藏环境（包括大环境和小环境）方面，斯道文库是做得非常仔细谨慎的。

李雪

庆应义塾大学斯道文库所藏中国儒学书籍很多，文库中宋元刻本大概有 50 多种，日本人称中国刻本为“唐本”。参观时，文库长佐佐木先生为我们展示了一些有特色的书籍，所见有《风雅》唐代装法，一帖帖缝会的样式，而这样装帧形式的书在日本普遍。但书库中的中国古籍并没有按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排列，而是中文和日文的书籍都混杂在一起，让人很难分辨。在库内，我们还见到了其不同时期收藏的图书馆的藏书章，其中有一枚是由上海某位先生所刻。



▲《风雅》唐代装法

梁平访纸说缘由

□浙江 汪小帆

之所以对重庆梁平二元纸念念不忘，盖源于以下一些缘由。

2013 年，我们在对全国非遗手工纸进行电话调研时，梁平县非遗办公室的郭主任允诺给我们寄上梁平二元纸的样纸。很快，样纸寄来，从外表观察，这些略为粗陋的黄色毛边纸，纸面结构疏松，颜色偏黄。可经过仪器检测，各个项目又符合指标要求。由此，修复人员对梁平二元纸的采购问题引起了争议，当时的意见归纳有三种：一种意见是，这种纸张类似土法造纸，但过去从没见过用这种纸印书的，为节约起见，不如把有限的经费花在刀刃上，不买也罢；另一方则认为，常言道有备则无患，即使不常用，不妨少量购买，以作储备，再则这个地区的纸，纸库里从未收藏，即便作为一个品种充实也不错；剩下的意见则是伯仲之间，可买可不买。

正在大家为买还是不买的问题纠结时，有人送来一本家谱请我们修复。而我们意

外地发现，此家谱前面有三十余张书叶，竟然跟手头梁平二元纸的相似度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此，买还是不买的纠结一刀砍断，我们立马订购了 2000 张梁平二元纸入库。当然，这次小小的争论，对我还是深有启发的。我感受到，经验再丰富的修复人员，在其修复生涯中，所能见到的纸张终究是有局限的。这个局限性，在于其经手修复的书籍用纸本身就有局限性，你没有见过的纸张，恰恰是用在你没有修过的书籍上，这是常态。因此，你没见过的纸张，并不等同于没用，在选纸过程中，要克服经验主义，风物长宜放眼量。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某些自己未经过目或暂时没有使用需求的纸张，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只要符合古籍修复要求的纸张，并经过认真检测和评估合格的，都可选购、存放，以备需时所用。当然，在受购纸经费限制时，该理念不太容易被接受，但每一个修复人员都需要建立这样的认知和理念。梁平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不过，梁平二元纸真正购入时，还是出现了一些波折。

当梁平方面把这批纸张寄送到我们

修复中心后，在验收时竟然发现所有纸张上都出现淡褐色斑点。此事非同小可，我们紧急联系了郭主任，向他通报情况。热心而负责的郭主任非常重视，放下电话亲自前往纸坊现场了解问题的原因，当晚便电告我，他与做纸师傅分析了出现斑点的原因，估计是在料池里存有一些陈料，而这些陈料已经开始长黑斑，纸工图方便，没有清理陈料又把新料倒了进去。他因此而感叹做纸的师傅对自己的要求总不是那么严谨的。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郭主任打来的那个电话，那天晚上从八点多开始，我们交流了将近两个小时，他给我讲述了梁平手工纸的历史：抗战时期，重庆作为陪都，大量的政府机关及新闻媒体聚集于此，这些机构对于纸张的需求，使得梁平二元纸在当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辉煌时期。他也谈到了当前梁平手工纸的困境、单一的市场渠道，乃至它的没落。最后，郭主任还跟我探讨了梁平手工纸未来发展的前景，如何打破困境，再创曾经的荣耀。我听了他的话深受感动，坦率的讲，这几年我接触到的非遗工作者不少，但像梁主

任这样的，还真不多。梁平纸的波折，让我认识了一个敬业、负责、有担当的业内人。

与梁平纸的缘由，至此并未结束。2015 年 12 月 8 日宁波天一阁博物馆举办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纸张保护：东亚纸张保护方法和纸张制造传统”项目成果发布会及学术研讨会。在此次会议上，一位日本纸张专家在专题发言中，介绍了梁平县手工纸的制作特点，还播放了一段榨纸工序的视频，表明当地采用的是人力杠杆原理来榨纸。那时的我，实地考察手工纸去过的地方还不多，可谓孤陋寡闻，望着屏幕上这些画面，心里暗暗下定了决心，必须去梁平看一看，亲身感受造纸的现场氛围。

转眼即到 2017 年年底，一算手头还余几天假期，索性收拾行囊，再来一趟说走就走的访纸之旅，目标重庆梁平，踏勘梁平二元纸、拜访中国竹帘的发源地、观摩梁平的年画；顺道去明代便有“南方纸都”之称的湖南隆回；还得上蔡伦的故乡耒阳，作为和纸打交道的人，纸张的祖师爷理应要祭拜一下的；最后再下浏阳看看五代人守护下的“古山贡纸”。



小帆说纸

云南省图：书写战“疫”文化担当 不停古保工作日常

□采写：刘晓立 受访：计思诚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影响着千千万万国人的生活，每天拿起手机关注“肺炎疫情实时追踪”成了睁开眼的第一件事，为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开学日、工作日一再后延，这也让大多数普通人拥有了一个难得的假期，每天除了日常生活，就是琢磨着如何度过没有确切结束时间的长假，有人修炼成了大厨，有人自编自导自演过了一把“戏瘾”，也有很多人虽宅在家不出门，却利用大规模数字资源继续自己的阅读与研究。

疫情期间，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图书馆，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各显身手，创新服务，满足读者需求。本期，记者专访了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计思诚，就疫情期间馆内举措及相关古籍保护工作开展作详细介绍。



▲云南省图书馆向湖北省图书馆和武汉图书馆捐赠抗疫生活物资

做好疫情防控，同时充分满足读者文献需求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云南省图书馆于2020年1月24日13时起实行了全面闭馆。为保障广大读者的权益，闭馆期间对到期外借文献免除逾期费用，数字图书馆等线上服务正常开展；坚持网上“天天开馆”，云南古籍数字图书馆及各类数字资源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向读者开放、为读者所用；并通过多种渠道发布“抗疫”专题，编辑《云南省图书馆抗击疫情舆情资讯》和《谣言捕快》，为读者提供权威资讯。同时，云南省图书馆联合上海市美术家协会漫画艺术委员会、上海图书馆发布“众志成城战疫情网络漫画展”。2月18日，云南省图书馆全馆干部职工还以捐款购置、赠送新鲜蔬菜的方式，向身处疫区中心的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图书馆同仁伸出援助的双手，以实际行动驰援兄弟省市图书馆，为同心协力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一份力量。

在古籍文献的服务方面，云南省图书馆重点利用之前古籍数字化的成果，积极推广、普及利用。从2014年开始，云南省图书馆逐步开展古籍数字化的加工作，首先是在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支持下，对馆藏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部分古籍进行数字化，后来馆里每年投入一定经费在古籍数字化方面，对其他一些馆藏珍稀文献进行了数字化，取得了重要成果。随后，为了扩大数字成果的利用，响应国家图书馆发布共享古籍数字资源的号召，云南省图书馆建设了云南古籍数字图书馆平台，目前发布有480部、2103册古籍文献数字资源，免费提供读者使用。在疫情期间，云南省图书馆加大了宣传推广力度，平台开放力度也更大，读者只要注册登记，即可享受云南省珍贵古籍文献数字资源，包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云南现存最早有纪年的写本《护国司南抄》（1052年）和大理国时期的写经，明嘉靖时期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家族木公的《雪山始音》、木增的《山中逸趣》等。这样一批最珍贵的文献，都可以在平台上免费查询，而且都是高清晰的。所有图片的清晰度既能满足读者对版本、内容的研

究，还能满足书法爱好者对书法研究的需求，比如有研究生就利用这一平台，进行了《大理国写经书法风貌的探究》的研究；也可以满足纸张研究的需要，因为它的纤维都是看得清楚的。这样一来，读者在疫情期间，就可以足不出户赏析到这些珍宝，满足读者的文献需求。

疫情期间，古籍保护工作有序开展

云南省图书馆工作人员于2020年2月3日正式复工，同时要求相关人员严格佩戴口罩上岗，开展体温监测、登记，对办公场所进行消毒，等等，在做好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各项古籍保护工作一直在有序开展，并未受疫情太大影响。

古籍修复工作在正常开展，就办公环境来说，一个修复师一张修复桌子，能保证一定距离的间隔。目前馆里的修复师杨利群老师正牵头开展贝叶经的修复研究。因为贝叶经是写在贝多罗树叶上的，与其他以纸为载体的文献有较大不同，有很大的技术难度，包括用胶等技术问题还没有最后攻克。但是因为之前云南省图书馆已经有了大量如彝文、东巴经、傣文绵纸经、藏文等少数民族古籍文献修复的经验，所以在研究方面也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力量，相信贝叶经修复的攻克也只是时间问题。除了贝叶经的修复研究，目前还在进行一些常规的字画装裱工作。尤其是春节前，馆里举行了春联书赠活动，邀请了云南省知名的书画家来写春联、送福字，还请名家赐墨宝，为即将在昆明建立的书香驿站等题字，杨利群老师现在还同时带着他的徒弟对这些书法作品进行装裱。

古籍整理方面，因为书库太密闭了，为防止交叉传染，现在并未开放。云南省图书馆古籍普查的工作人员就利用现有的卡片目录进行古籍和民国线装书的普查、编目。另外，云南省的古籍普查已经到了最后的审校阶段，所以工作人员也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做古籍普查登记的审校工作，一部分做民国线装书的普查登记工作。民国线装书的普查方面，考虑到疫情的影响，古籍整理办公室的桌子又是围坐在一起的，为了做好防控，云南省图书馆特别安排部分工作人员轮流把卡片带回家进行登记，当然卡片要

确保不能有任何遗失。2月份，根据卡片，已完成了227部民国线装书的普查登记。卡片登记完以后，下一步要到书库去核对、拍书影，分层次、分步骤地开展对民国线装书的普查工作。

此外，云南省图书馆也积极鼓励馆内工作人员对古籍进行研究。目前历史文献部一位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馆藏古籍《磻砂藏》的研究，也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这些工作基本都是春节前后开展的，受到疫情的影响很小，均在有序开展中。

2020年新举措：加大培训与宣传推广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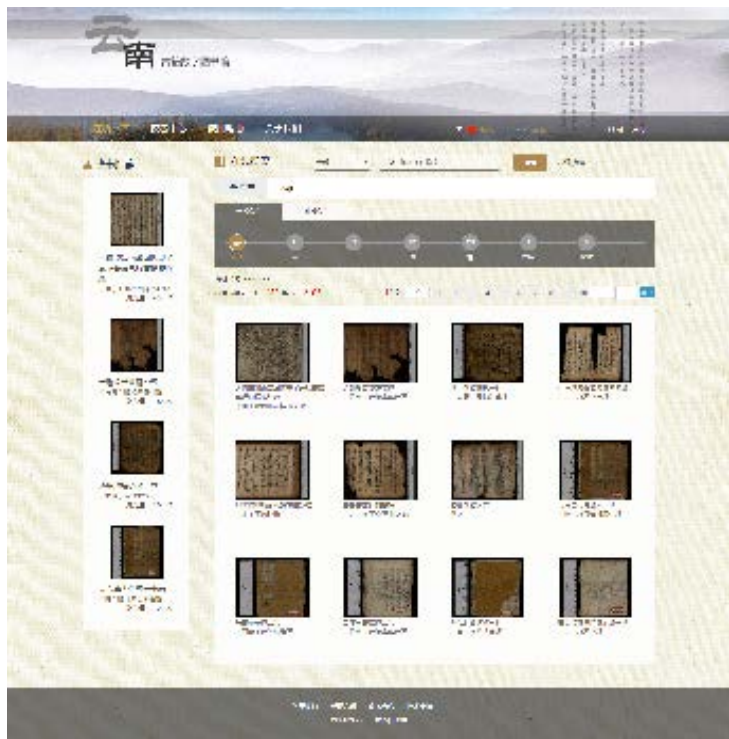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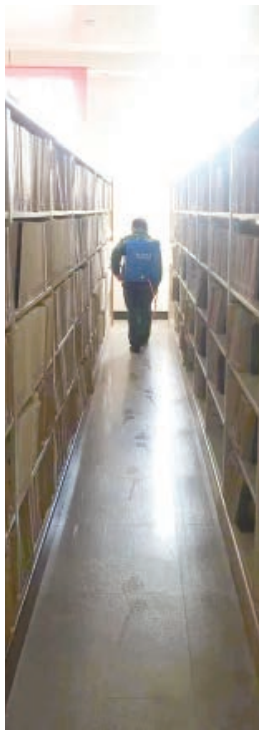
云南省图书馆今年计划举办几次培训，尤其是古籍修复方面，希望以培训的方式来带动修复一批古籍，同时也使修复人员的技艺得以不断提高，梯队化培养人才。比如，春节前“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图书馆学会“下基层文化文艺小分队”来到大理洱源，在当地看到了一些破损的古籍亟待修复，因此，云南省图书馆原计划于3月初在大理洱源县举办一个汉文古籍的修复培训班，以骨干带新人的方式，边培训，边开展修复，让新人能够有机会在骨干的指导下参与到修复中来，既完成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同时也能修复一批古籍文献。但现在由于疫情的影响，禁止人员流动，这个计划暂时会搁浅，但会确保在今年内完成。今年还计划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举办一个藏文古籍的修复培训班，尤其是在下一步全国藏文古籍保护工作中，云南省图书馆将作为藏文古籍修复基地，培训班也是自然要承担的重要工作。此外，还会举办一期传拓培训班，以师带徒的形式进

行人才培养工作。

古籍数字化方面依然会加强，在现有480部的基础上逐步增加数量，还要确保质量。

古籍普查方面，目前云南省的古籍文献普查工作基本已经告一段落，大的公共馆已经普查完，还有个别馆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没有完成普查，但是能开展的现在已经普查完了。目前云南全省有42家单位完成了普查工作，共对34587部古籍进行了普查登记。从今年初开始，民国文献线装书的普查工作已经启动，接下来将把普查的重点放在这方面。今年云南省图书馆仍准备参加中国古籍保护协会举办的“中华古籍普查文化志愿者服务行动”，一方面是要完成古籍书目的审校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要进行民国线装书的普查登记。

马云川馆长十分重视古籍保护工作，他亲自策划，准备在云南省图书馆成立一个修复传拓研习馆，目前正在协调各方面，加上疫情的原因，比原计划进展缓慢，但都在有序推进中。与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侧重于师徒形式的技艺传承相比，云南省即将成立的修复传拓研习馆将更多着力于面向社会，通过吸引大量社会人员参与，来扩大古籍修复和传拓技艺的宣传和推广。古籍保护工作从2007年到现在已经是10多年了，有了很大的保护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积淀，比如云南在少数民族古籍文献的修复方面在业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在社会层面上，公众对古籍，以及古籍保护、古籍修复技艺等还没有形成认识，离真正的“活化”还有很远的距离，所以云南省图书馆希望通过成立一个研习馆的方式，走出行业的范围，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古籍保护中，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



黄跋中的版本鉴定学与修护观

从黄丕烈旧藏《图画见闻志》跋语说起

□山东 李孟男

2019年11月，在导师李勇慧的带领下，山东艺术学院2019级文物鉴定与保护（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参观了国家典籍博物馆陈列着的、来自全国公私藏的珍贵古籍，并在缩微阅览室查阅了已制作成胶片的古籍善本资料。其中清代乾嘉时期著名藏书家和学者黄丕烈旧藏、宋刻配元钞本《图画见闻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该书黄跋中反映了黄氏鉴定其版本的过程，也反映了黄丕烈的古籍修护思想，这正是导师带领我们同仁一直在研究的。

黄丕烈与《图画见闻志》

黄丕烈（1763—1825），清江苏吴县人，字绍武，号尧圃，晚号复翁，又自号“佞宋主人”“书魔”“痴绝”等。自幼家境殷实，少时受到良好的教育，表兄石蕴玉称他“少岁读书，务好精纯”。19岁中秀才，26岁以第三名中举人，但在此后十多年的历次会试中，屡屡落第，未能考取进士。直至嘉庆六年（1801），39岁的他由举人补授直隶知县，但此时他已无意仕途，遂辞官归里。惟喜藏书，他于嘉庆七年（1802）夏五日跋明刊抄本《石屏诗集》十卷云：“惟此几本破书，尚有不能释然者。”黄丕烈与周香严、顾抱冲、袁寿阶并称苏州藏书“四大家”，其藏书多达三千余种三万余卷，既精且富，且好作题跋，一生撰有题跋近千余篇，涉及珍善典籍800多种。其记录、表现出来的内容，都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缪荃孙在《尧圃藏书题识》序中感慨道：“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非《读书敏求记》空发议论可比。”

为度藏稀见珍本，黄丕烈名其书斋曰“读未见书斋”，自言：“余性喜读未见书，故以之名其斋。”斋中藏有：《前汉书》一百二十卷、元印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宋刻本《咸淳临安志》九十三卷、宋刻配元钞本《图画见闻志》六卷等珍贵善本。

《图画见闻志》是继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后又一画史巨作。该书继承和发展了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之纪传体和史论相结合的传统，是研究唐末至北宋中期绘画发展面貌的重要典籍。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所考证，《图画见闻志》共存21个版本，黄丕烈读未见书斋所藏为宋刻本配元钞本，半叶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小字双行同，单黑鱼尾。书分六卷，前三卷元钞本，后三卷为宋刻本。黄丕烈跋，字体为小行楷书，字划严谨。此书先后历经藏书家黄丕烈、汪士钟、铁琴铜剑楼瞿氏之手，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向为世人所重。

从黄跋看黄氏鉴定版本的方法

黄丕烈不仅善藏书，而且善于利用版本的外观形式来鉴别古籍版本。如周香严所藏残宋本《图画见闻志》，香严疑此书为翻宋本，黄丕烈遂取之勘之。黄氏在为宋刻本《图画见闻志》一书所作题跋中，记述其版本鉴别的过程：“及携归与洞簀同观，亦认为翻宋本，遂取前所收者勘之，行款虽同，而楮墨俱饶古气，细辨字画，遇宋讳皆缺笔，翻本不如是也。爰揭去旧

时背纸，见原楮皆罗纹阔帘而横印者，始信宋刻宋印。以翻本行款证之，此即所谓临安府陈道人书籍铺刊行本也。且余所藏南宋书棚本如许丁卯、罗昭谏唐人诸集，字画方板皆如是，益信其为宋本无疑。”

可见黄丕烈鉴定宋刻本《图画见闻志》版本，是从纸墨、避讳、纸张、行款等方面进行断定的：



第一，从纸墨的“俱饶古气”，到“遇宋讳缺笔”，黄氏从侧面证明了香严所藏本为宋刻本的可能性；第二，黄丕烈通过揭去其旧背纸，观察纸张纹理、质地，开始相信香严所藏本为宋刻宋印本；第三，黄丕烈据翻宋本的行款证明，其跋文中提到的陈道人书籍铺是南宋时期刻书最为突出的一家。陈道人原名陈起，陈起有子续芸，承其父业开设书坊，叶德辉在其《书林清话》中称：“临安书棚陈氏所刻书，每卷后均刻字一行，其文亦详略不一。”根据行款，黄氏又加以南宋书棚本《唐人诸集》反证香严所藏《图画见闻志》后三卷为宋刻本无疑。利用古书行款来证明其版本，是黄丕烈常用的方法。

通过黄跋，我们从中可以发现，黄丕烈在长期的藏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版本鉴定经验。黄跋中所记载的版本鉴定经验成为研究版本鉴定的重要信息。正如明影宋抄本《砚笈》四卷黄跋云：“余之得遇此书，固余之幸。此书之得遇余，亦此书之幸。”

从黄跋中看黄氏修护观

黄丕烈作为清代四大藏书家之一，嗜书如命，对书的品相要求极高，对一些装潢不甚满意的书常常命工重装。黄丕烈在宋刻配元钞本《图画见闻志》六卷中的跋语相当精彩，其曰：“因宋刻本与此长短不齐，遂损此旧装，以期画一。上下方各以余纸护之，俾两书原纸不伤，而外观整齐，于古书旧装，名为损实则益也。……命工装池，与元抄为合璧，所赠虽出自良友，而工费几及缗钱四五千，为古书计所不惜矣。补缀之处，有白纸者皆旧时误写字迹；其蠹蚀之余，悉以一色旧纸补缀。遇字画烂格缺断者，倩洞簀以淡墨描写。至于原刻原印之模糊缺失，悉仍其旧，谨慎之至也。”可见黄丕烈对古籍修护有其独到的见解，其所撰宋刻配元钞本《图画见闻志》六卷一跋中体现了四点黄氏修护观念。

上下镶衬，保护原书。黄丕烈在对

元钞本《图画见闻志》与宋刻本《图画见闻志》重装时，因版本大小不一，需在原书纸张内加大张的衬纸，使天头地脚长出，使其书页长短划一。据跋语可知，这样的古籍修护方法有三大优点：其一，上下镶衬的方法，使原书的天头、地脚、书背三边都被衬纸保护在内，不管是面对后人翻阅还是古籍在与空气的长期接触下逐渐氧化、酸化等情况，外围镶嵌的衬纸都对古籍原书纸张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其二，两种版本的古籍合装为一册时，因原书开本大小不同，所以为了合装后的古籍外观整齐，对其进行上下镶衬，镶衬后的古籍外观变得更加整齐、干净；其三，镶衬后的古籍，翻阅起来会更加挺实，原书纸张的黄纸与镶衬的白色衬纸之间相互呼应，使原书书页看起来更加舒适清晰。如果书页较薄，后一叶的文字会隐约透到前一叶来，干扰读者的视觉，镶衬后的古籍减轻或者消除这一问题，使读者阅读更加方便。

旧纸补缀，浑然一体。据跋可知黄氏用白纸补缀的地方是以前错误的字迹，而对虫蚀的补缀方式，是用与原书纸张颜色相近的补纸对虫洞破损处进行补缀。由此可见，黄丕烈根据古籍损坏的形式不同，在修复用纸上也进行了区分。黄丕烈在旧抄本《麈史》三题跋中写道：“卷尾剥去一行，以旧纸黏补。”早在北魏末年，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就有提到古籍修复用纸的选择：修复毁裂古籍时应使用薄纸，而且薄纸应与修复古籍纸张的纹理相符，以达到修复之后，如果不对着亮光仔细照看，就难以发现修复的痕迹的效果。黄丕烈所修复的古籍流传至今，有的已历经数千年的历史。黄氏所修之处，如不加以仔细辨别，难以分辨其修复痕迹，补缀之处与原书纸张浑然一体。

划栏补字，补其缺失。黄丕烈对于古籍字损、画烂、栏格缺断的修复方法是对古籍进行划栏、补字、补画。所谓“划栏补字”，就是对于因虫咬、鼠啮等造成的断栏缺字古籍进行修补之后，在断栏的地方，要依据原书栏格的样式划齐栏格。在缺字的地方，需要根据相同版本，仿照原书字体补全。

黄丕烈在跋《百衲居士铁围山丛谈》八卷中感叹道：“书贾补缀未填写，人视为废物矣。惟余知其源流，故得之而手书其缺失。”根据古籍源流，在补缀处手书其缺失，是对文献内容、思想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在国家图书馆110周年大展中，第一展厅“国宝吉光”里涉及到“划栏补字”的古籍有五部，包括宋刻本《三国志》六十五卷、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宋嘉定六年（1213）鲍澣之汀州刻本《九章算经》九卷、宋绍兴刻本《战国策》三十三卷、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刻本《周贺诗集》一卷。

仍存其旧，整旧如旧。由跋可见，黄丕烈对于原刻原印的缺失，仍存其旧，生怕错误的描写会破坏古书文字内容的真实性。在如今古籍修复保护包含两个方面的保护功能，一个方面是最大程度保持古籍原貌即文物性和延长寿命。另一个方面就是，保护传播思想文化的文字，传承人类文明，这方面更能体现保护珍贵文献的价值。然而从黄丕烈的跋中可以发现“整旧如旧”的思想早在乾嘉时期，黄丕烈就开始倡导了。



作为古籍修复者，我们日常所修古籍很大部分修后即归还给所有者，对修复效果多为即时所见。2019年在参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过程中，看到很多古籍善本是若干年前修复的，今天它所呈现出的修复效果，对我们今后的修复工作是一个参考。

“大展”中，在补纸的选用上印象最深的是宋写本《宗藩庆系录》，其所用补纸颜色与原书页最浅处接近，感觉和谐，且若干年后所呈现的修复状态较好。

关于修复在形式上的灵活性、协调性、美学性等方面的启示。古籍修复在修旧如旧、可逆性、最小干预的大原则下，可以适度的追求美学性、协调性，例如我们熟知的金镶玉这一手法，惯用天3地2的比例，而“大展”中展示的一些古籍金镶玉形式多根据书品大小来定，不拘泥于天大地小的惯例；镶纸颜色上也可采用除白宣纸之外的手工用纸，因书制宜修补效果也很好。我想这在我们今后的修复中是否也可灵活运用呢？

此外，我重点留意了一下包角的材质和颜色，古籍善本多用绢，且颜色清雅，多为月白、象牙白、浅蓝色等，对此，可收集照片，平常注意收集相似颜色的绢，形成备用。

大展中古籍修复用纸的展示，详尽标明了纸张名称、克重信息，对我们纸库的陈列也是一个启发，我们在陈列时也可按类摆放，标明克重等信息，本着便于查找、取用的方针进行陈列。

本次展陈除国家图书馆的馆藏外，还有一些来自地方、民间的古籍善本，有的也经过修复处理，我个人认为这些藏品的修复与国图的修复存在一定差距，特别是在细节、美学、和谐层面上，这对我们修复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重要提示。

（李长红）



感受前辈的古籍修复